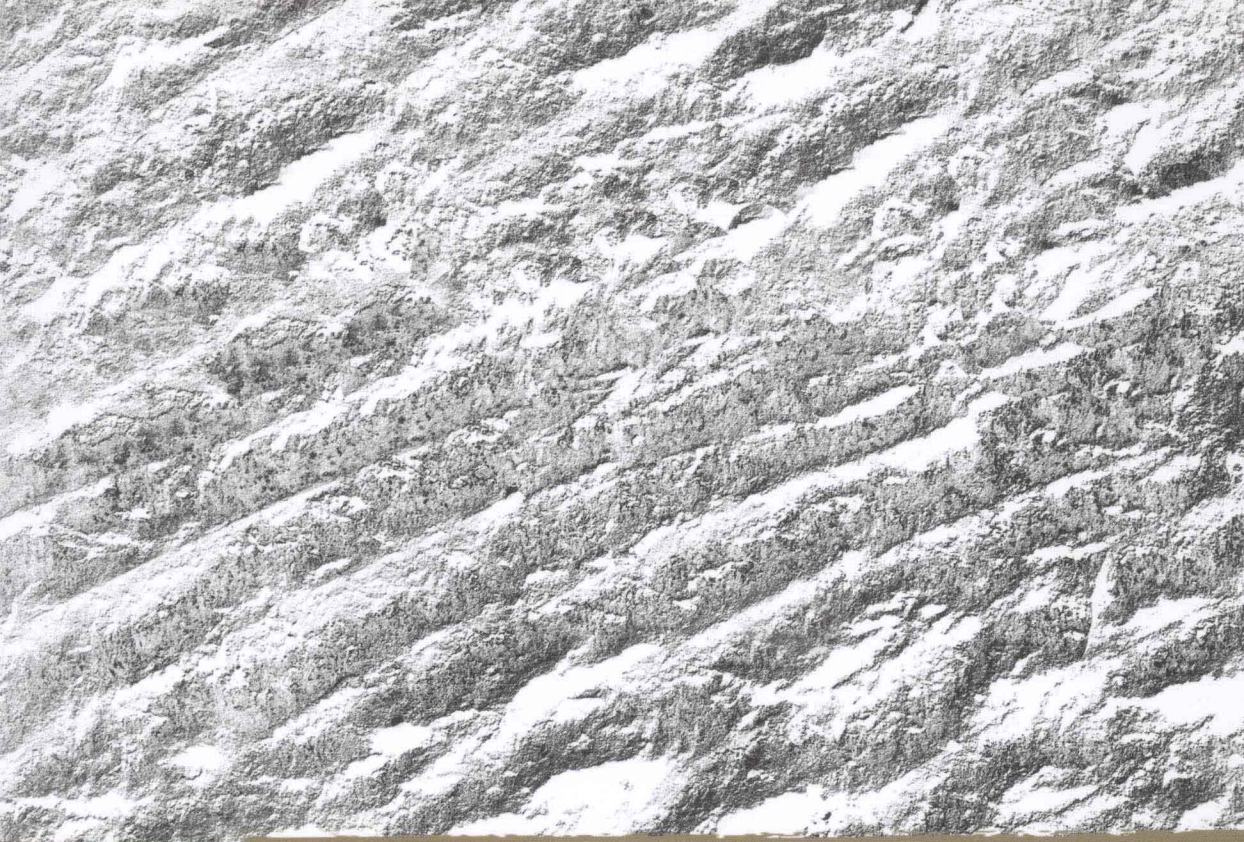




第三党历史

Disandang Lishi

王夫玉 ■ 编著

从1926年11月提出创建第三党起，经1927年冬到1947年春间先后出现的、具有承相传性的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委会）、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生产人民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解委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之过程，至1949年11月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第五次干部会议止的23年，是为第三党历史。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第三党历史

王夫玉 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内 容 提 要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开启了38年短暂的中华民国历史。该书以中华民国历史为背景,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为标杆,以第三党重要党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线索,以相关史证资料及原始档案为依据,历史、辩证、系统、客观地研究和再现了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23年的历史。该书不仅全面科学地梳理、归纳、甄别、整理和描述了第三党历史,而且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建国前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民主革命史,还首次对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作了系统的评述。该书对中国党派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中华民国史甚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亦很有参考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党历史/王夫玉编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641-4343-5

I. ①第…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 IV. ①D6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9023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210096)

出版人:江建中

网址: <http://www.seupress.com>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玉河印刷厂印刷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0.5 字数:326千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41-4343-5

定价:52.00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1830

认识第三党^{*} (代序)

以历史为鉴,可扬利去弊。历史,是指人们对人类社会过去的时间、地点、人物、行为、事件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连续记录、诠释和研究,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如果历史记录被歪曲、不正确或欠真实,那么鉴史为今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历史的撰写要有一个时间沉淀过程,不能将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当作历史来写,著者认为沉淀的时间应不少于“一个甲子”,即60年。

党史也是一种历史,是专门系统记录一个或几个党派的言论、行为、事件和重要人物等内容的文献,《第三党历史》即如此。本书所言的第三党,系指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所经历若干历史阶段之众多名称的统称,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等党派、团体组织和社会民众对它的普遍称谓。由于第三党具有的特殊的建党背景、不屈的政治探索和曲折的发展道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时60余年的沉淀,需要我们回过头去,科学地梳理、甄别和认识第三党与中国共产党殊途同归的民主革命史,以便更好地理解 and 践行胡锦涛总书记的“同心”思想:在思想上,与中共同心同德;在目标上,与中共同心同向;在行动上,与中共同心同行。此亦为编撰本书之使命。

^{*} 主要内容源自:科学认识建国前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3):39-44。该文获全国“2011年理论研究优秀论文奖”三等奖,受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的表彰和奖励。

一、第三党的由来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的谭平山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的报告和发言中提出了第三党的问题，并作了全面探讨。谭平山所说的第三党，是指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他设想：“要么在现在的国民党内组织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控制，清除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联系；要么不要国民党而成立新的第三党，例如工农党或联合党。”第三党的问题就这样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来了。

谭平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所谓“第三党”问题，一直受到误解。当时在共产国际中几乎没有人能弄清楚谭平山提出“第三党”的真实含义，并在后来把“第三党”作为他的一条重要罪状，列入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该案决定开除谭平山的党籍。由此，第三党的问题开始在中共内部发酵，虽然没有正式成立，但已开始产生事实影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激起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极大愤慨。不久，武汉政府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也日益动摇和反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革命者对国民党更加丧失信心，又纷纷议论另组一个新党的问题。在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邓演达提出组建第三党的想法后，谭平山自然积极响应，并参加了酝酿和讨论工作。谭平山虽然多次与很多人谈过组织第三党的问题，但他对邓演达所提出“共产党解散、国民党再次改组而组织第三党”的想法，是持否定态度的。谭平山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存在，应改组国民党，或另组第三党，因为怕第三党不能真正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不得不拿共产党来推进这个第三党。邓演达也提出沿用国民党的名称，纳入共产党的纲领组建一个新党的设想，谭平山与他反复讨论。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去莫斯科，两人仍频频通信，保持联系，继续酝酿组建新党的问题。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言》

解读了“三民主义的真正意义”；指出了“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是工、农、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其对抗的仇敌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土豪绅士及与他们相勾结之高利资本家者”；声明该委员会的责任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但这个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当时并未形成一个实在的组织。尽管如此，但这仍足以表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组建一个新党的决心。《宣言》传到国内后，谭平山等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谭平山利用自己在各方面的影响，开始出面进行联络，着手组建新党。

1927年底，谭平山在上海成立“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与章伯钧、季方等开始筹备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1927年12月或1928年1月初，谭平山等人在上海一个外国人开设的旅馆里秘密地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谭平山主持了大会，会议宣告中华革命党的成立。会议推举了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邓初民、李世璋、张曙时、马哲民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表示“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团结孙中山先生的真实信徒，去接受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向前奋斗”。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由于它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当时在社会上被称为“第三党”。例如，上海黄叶书局1928年10月印行《第三党讨论集》一书，编者蓝玉光，该书“搜集各方面关于第三党所发表的论文”，包括迪可《论第三党》等12篇文章；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1928年编印的“宣传丛书”之三即命名为《机会主义的第三党》（191页），收录关于第三党的文章14篇。

关于中华革命党成立的具体时间，学术上尚有争论。有的说是1927年冬，有的说是1928年春；有的说是1928年2月，有的说是1928年3月。根据有关文史资料推测，著者认为1927年与1928年之交，即1927年12月到1928年1月间成立的可能性最大。一方面，从主导者的背景和处境追源。要成立第三党和重组中华革命党的主导者是谭平山，1927年8月，因参与南昌起义，他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了国民党党籍；同年11月，他又因反对共产国际指示，被当时的“左”倾中共中央开除了共产党党籍，谭平山随即在《申报》上登出启事应对，并透露要草拟

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党纲,由此加快了组党步伐。另一方面,从有关文史资料推测时间。在日本《国际》杂志上所刊登的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1928年2月25日的决议案中,提到“第三党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将会变成反动派的工具”,说明中华革命党是早于3月成立的;1928年1月出版的《顺直通讯》载有《第三党与托洛斯基派的本质与活动》一文,说明中华革命党的成立早于2月。另外,也有这种可能,即中华革命党从1927年冬到1930年春,延续了将近两年半时间,虽然有名称,有纲领,有组织,有活动,但它的名称在开展活动中并未统一采用,它的纲领经谭平山草拟后并未通过,它的组织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或是筹备阶段,其政治团体并未正式成立。

邓演达于1927年8月出国,到1930年5月才从欧洲返回国内,期间,中华革命党领导人一直与他保持联系。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十几个省区代表参加的中华革命党全国干部会议(一干会),正式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委会)。会议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的政治主张。会议选举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等25人当选为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

上海各大报纸虽同情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但惧于国民党蒋介石权势,不敢刊登有关会议消息。9月1日,只有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每日》、《上海新闻》摘要刊登了《政治主张》。当时外界认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中华革命党改名而来,因此仍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称为“第三党”。邓演达批阅后十分不快,即派人前往报馆交涉更正。邓演达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应该清除的叛徒,不能代表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是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但第三党的称呼却因此在社会上很快传开了。

由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及影响声势日益扩大,第三党逐步被公众所认识,“第三党”名称也被其后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解委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所认可接受。例如:为配合解委会中央于1940年10月10日向全党发出《整党通知》,解委会中央发表了《怎

样做一个第三党党员——告全党同志书》；在1947年2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和《决议案》中，均有将第三党用作对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注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也常在正式场合使用第三党称呼。例如：1937年8月，蒋介石在拒绝邀请章伯钧参加于南京召开的国防参政会时，曾说：“邓演达被杀了，第三党已不存在。”1945年1月，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宴请章伯钧、郭则沉、韩兆鹗、刘宗宽等人时说：“邓择生(演达)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今后我们希望同第三党的朋友加强联系，紧密合作，有事多商量。”直至194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电示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方方、潘汉年、钱之光，明确指示：在香港列名响应“五一号召”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均可参加新政协。并希望“即分别与民革、救国会、第三党(即农工党)及致公党接洽，推出代表，并设法护送他们到解放区来”。在此电文中仍用第三党称呼中国农工民主党。

二、第三党的简史

1931年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一事引起宁粤分裂。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趁势很快组织起以邓演达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讨论和制订了全国性武装起义计划。临委会的军事准备和组织、宣传工作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极大威胁，导致邓演达被害。在邓演达被捕的同时，临委会的中央机关和联络点也遭到严重破坏。由于邓演达等被捕，全国性武装起义计划最终流产。邓演达的牺牲使临委会的领导层顿失核心，受到了很大打击，这是临委会经历最艰难的阶段。当时临委会领导层思想混乱，一部分人因失去邓演达，对临委会失去希望而脱离了组织；一部分人提出不能再戴着国民党的帽子而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一部分人力主按邓演达的遗志搞下去；黄琪翔则在上海以党务主持人身份继续按原有局面主持工作，出于多数党员对国民党的仇恨，将党名暂改为“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黄琪翔领导的临委会、李济深等国民党左派势力以及福建地方

反蒋力量,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并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福建事变”由此爆发。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定福州为首都,宣布脱离国民党,与蒋介石政府决裂。参加福建事变的领导人集体宣布退出国民党,决定组织“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黄琪翔听从蔡廷锴意见,为了化解矛盾,团结对敌,说服第三党同志,为顾全大局,经反复磋商,12月11日,临委会策略地以“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委员会”名义,在福州《人民日报》登出《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宣告解散启事》和《第三党正式宣言解散,一致参加生产人民革命党》,宣告:解散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之原有组织,一致参加生产人民党。随后,“福建事变”在蒋介石的镇压之下失败。

临委会屡仆屡继,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为了迅速恢复党的组织,1935年秋,章伯钧从日本回到香港,与彭泽民等就重振组织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黄琪翔从德国来信赞成恢复组织。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二干会),集中解决了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解委会)。会议选出了由黄琪翔、章伯钧等19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黄琪翔为总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纲领》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告同志书》。抗日战争期间,为配合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解委会领导人联络建议下,各党派同意建立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因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变为个人会员制。

抗战胜利后,解委会从1945年秋开始,一方面在民盟中发挥作用,一方面进行了组织复原工作。1946年春,中央机关由重庆陆续迁回上海。1947年2月3日,解委会在中央机关举行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由章伯钧作《党务报告》;会议决定将解委会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关于党的纲领、路线和基本方针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会议选举了由25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10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章伯钧、彭泽民分别任委员会主席。第四

次全国干部会议是一次“改造党、健全党、扩大党”的重要会议。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宣布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同日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6月16日,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以示竭诚。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共134人,对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筹备。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胜利召开,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纲领性文件,决定了首都、国歌、国旗和采用公元纪年。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民作大会发言,表示农工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共产党长期合作下去,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今后的方向和工作,1949年11月14日至2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学习和传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文件;通过了《政治决议》、《党务总结报告》和《五千会议宣言》等文件;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章伯钧和彭泽民分别任主席。《政治决议》确立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行动纲领。

三、如何写第三党

要科学地梳理、甄别、认识与撰写好第三党的历史,必须把握和运用好以下四个方面的方式方法:

(一) 以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为背景,历史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

全面分析人类阶级社会的发展,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社会是由历史构成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按阶级或阶层划分的,阶级或阶层是由政党组织的,政党是由领袖领导的。而且,阶级社会越发展、越先进,这种递进规律的约束性或作用就越显著。由此可见,任何党派的历史都

脱离不了其所处历史阶段的时代印迹。同样的,第三党的历史也离不开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而独立存在,第三党的历史是融入民国史的,是民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认识和研究第三党的历史,必须以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为背景,历史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

在中国近代史中,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间,中国一直处于被列强侵略和掠夺之中,人民一直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作为辛亥革命的高潮和最重要的革命成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从而结束了在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帝制,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共和时代。经过1926—1928年两次北伐,至1930年10月初中原大战取胜,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才基本确立其在中国的正统地位。这是第三党产生的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的背景。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正式成立,它的组成仍然以同盟会为骨干。1924年1月20日到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它既标志着国民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完成,也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927年,因蒋介石“四一二”事变和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导致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宣告失败。大革命失败后,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人员,既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等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从革命立场转向,也不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而独树一帜,开始重建中华革命党和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第三党成立的党史渊源。

(二) 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标杆,辩证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中的民国史,经历了38年(1912.1—1949.10),第三党在建国前的历史近23年(1926.11—1949.11),与民国史的后一半重叠融会。这一时期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同代表官僚阶级、剥削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就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民主与统一等重大问题的既斗争又合作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中的第三党,必须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标杆,辩证地看

待第三党的历史。第三党的主体是从国民党内分离而来的,经过近23年艰难历程,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参政党——中国农工民主党。这是第三党历史的主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进行反共清党活动;7月15日汪精卫追随蒋介石在武汉实行“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此时,国民党左派从国民党分离出来,开始重建中华革命党和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此后10年,发生了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国民党残酷打压共产党、临委会和其他民主党派,临委会受到了严重破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并于1937年2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和中国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在八年抗战期间,第三党做了大量工作,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业绩,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为实现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1946年7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经过3年内战,国民党溃败,南京国民政府败亡。在解放战争期间,第三党始终站在中共一边,在各个方面支持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三) 以重要党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线索,系统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

相对而言,在民主革命时期,第三党不像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那样:政治鲜明,组织严密,机构健全,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强大。由于种种原因,第三党在政治上一直鲜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组织上一直比较弱小,在机构建设上一直难以健全,没有建立过组织严密、层次分明的党务体系。此外,虽然它的创立者多出自于军队,但很少有自己独立掌管的武装。所以,研究和撰写第三党的历史,很难从政治、组织、机构、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全面的整体叙述。对待具有特殊性的第三党的历史,必须以重要党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线索,系统地看待第三党历史。而年月时序则是第三党历史之系统性的外在表现,它有机地穿引着党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邓演达是第三党的主要创始人,除谭平山外,他的继任者和追随者,如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等,为第三党的生存、发展和开展各项工

作作出了重大贡献。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邓演达拥护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和事实形成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和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当汪精卫准备叛变时,邓演达曾多次与汪精卫斗争。1930年5月,邓演达经香港回到了上海,8月9日召集各地中华革命党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被推选为总干事。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蒋介石逮捕,同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年36岁。

解放前召开的4次全国干部会议和1949年11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是第三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第一次、第四次、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建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党名,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行动纲领。福建事变、淞沪抗战、实施民主宪政斗争和参与新政协会议筹备、新中国成立等历史事件,是第三党历史的骨干内容。尤其是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特别是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表明第三党紧跟中国共产党走,依靠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力量,基本实现了“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抱负,间接地完成了第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

(四) 以相关史证资料和原始档案为依据,客观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

在正式建党之初,第三党是以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同国民党右派决裂的政党,虽秉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衣钵,但同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故史称“第三党”。在其后的民主革命时期,虽逐步地坚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但仍有其不同阶段的、鲜明的政治主张。所以,为实事求是地反映第三党历史的真实面目,必须以相关史证资料和原始档案为依据,客观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

在史证资料方面,除了在档在编的资料外,近年来,为了记录第三党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研究室经过2年多时间,在2007年11月征集、整理和汇编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农工民主党》,记述了第三党中央和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各个阶段的政治态度、重大活动和抗日成果;为收集党史资料和配合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60周年,农工党中央研究室经过4年多时间,在2008年8月征集、整理和汇编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农工民主党》,记录了第三党在解放战争中所作的贡献;2010年,结合建党8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农工民主党从中央到地方又征集、整理和汇编了一大批史料。所有这些,为客观反映第三党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可资甄别的史料。

在原始档案方面,随着一些文史资料的逐步解密和重要历史人物日记的公开,加之农工党中央研究室对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一至五辑)进行重印,均有利于帮助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此外,近年来国内外在学术研究上也有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发表(见书后参考文献的期刊部分),均可用以充实、完善、填补、佐证第三党的历史。特别是2010年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之“前进英才”基金资助出版的两本专著:樊振的《邓演达年谱会集》、韩斯疆的《中日邓演达研究》,为第三党早期活动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党史研究启迪

2011年,是非常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年份: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诞辰145周年、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爆发80周年。再过不到2个月,还将迎来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从1911年秋天武汉城头震惊世界的一声枪响,到今天中国大地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图景,辛亥革命以来的100年中,中华民族从沉睡中苏醒,从备受欺辱奔向独立自由,从贫弱逐步走向富强,中华崛起的百年梦想正逐步变为现实。百年巨变,蕴涵丰富历史启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标明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前进方向。

2011年,也是首次提出第三党创建问题的85周年和第三党领袖人物邓演达殉难80周年。回顾和研究第三党的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

明晰地认清第三党与中国共产党殊途同归的民主革命史,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以下两个启迪的认识:一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中共与包括第三党在内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二是包括第三党在内的民主党派要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前者如同胡绳的观点:在讲民主革命历史时,单讲国民党和共产党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角色。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所以中间势力很重要。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中间势力大多偏向国民党。后者如同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的观点,他在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农工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对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政治上不断认同、行动上不断靠拢的历史;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指导下不断进步的历史;是一部逐步走向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走向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

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10月9日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的那样:“回首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我们信心百倍。我们呼吁,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贡献,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天,回顾、研究和撰写第三党历史,其目的就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和遵循“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践行“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融入为中华民族早日复兴崛起的伟大事业之中。

著者:王夫玉

2011年10月10日于南京

目 录

第 1 章 第三党建党的历史背景(1911. 10—1927. 7)	(1)
1.1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	(1)
1.1.1 同盟会及其活动	(2)
1.1.2 武昌起义	(10)
1.1.3 黄孝战役	(15)
1.1.4 南北议和	(17)
1.1.5 辛亥革命的意义	(21)
1.2 民初西式民主实验	(22)
1.3 溯源中国国民党	(25)
1.4 五四运动唤醒民众	(29)
1.5 中国共产党成立	(32)
1.6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36)
第 2 章 中华革命党(1927. 7—1930. 8)	(46)
2.1 国民党党内的抗争	(46)
2.2 提出创建第三党	(50)
2.3 酝酿成立新党派	(59)
2.4 重建中华革命党	(61)
2.5 《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	(63)
2.5.1 中国革命之特质	(64)
2.5.2 中国革命与劳动平民阶级的使命	(65)
2.5.3 时论的批评	(65)
2.5.4 国民党与共产党	(66)
2.5.5 中华革命党之任务	(67)

2.5.6	中华革命党之主义	(67)
2.5.7	中华革命党之政纲	(68)
2.5.8	和各党派的关系	(68)
2.6	同各方面的论战	(69)
第3章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8—1935.11)	(72)
3.1	临委会成立(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72)
3.1.1	邓演达出国考察	(73)
3.1.2	邓演达回国	(76)
3.1.3	会议准备	(79)
3.1.4	临委会成立	(84)
3.2	《政治主张》	(86)
3.2.1	中国社会的结构	(86)
3.2.2	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87)
3.2.3	我们的争斗目的	(87)
3.2.4	我们的争斗手段	(87)
3.2.5	我们具体的方案	(88)
3.2.6	我们和共产党及改组派的分界	(88)
3.3	邓演达思想	(89)
3.3.1	邓演达思想体系	(89)
3.3.2	平民革命思想	(90)
3.3.3	民族独立思想	(92)
3.3.4	军事思想	(93)
3.3.5	社会主义思想	(94)
3.3.6	哲学思想	(96)
3.4	临委会开展的工作	(98)
3.5	准备军事起义	(100)
3.6	邓演达遇难	(104)
3.7	发动“倒蒋抗日”	(109)
3.8	提议、策动“福建事件”	(115)
3.9	临委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20)
3.10	响应《八一宣言》	(125)
第4章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5.11—1941.3)	(128)
4.1	解委会成立(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	(128)